

智慧之門

論語

○ 齐冲天 齐小乎 注译
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智慧之门

論語

○ 齐冲天 齐小乎 注译

 中州古籍出版社

ISBN 7-201-01400-5  
定价：14.00元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论语/齐冲天,齐小乎注译. - 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5.5(重印)  
(智慧之门)  
ISBN 7-5348-2278-5

I. 论… II. ①齐… ②齐… III. ①论语-注译  
②儒家 IV. B22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1521 号

---

**责任编辑:**赵新民

**责任校对:**温向苏

**出版社:**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**发行单位:**新华书店

**承印单位:**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本:**850mm × 1168mm 1/32

**印张:**9.375

**字数:**205 千字

**印数:**5 001—13 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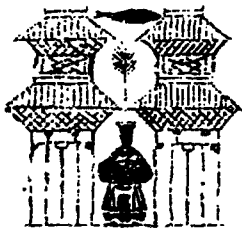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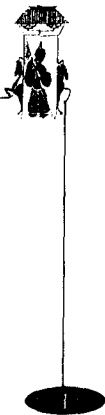
**版次:**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**印次:**200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---

**书号:**ISBN7-5348-2278-5/G·509 **定价:**1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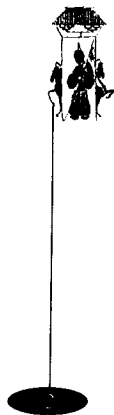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序言——关于孔子和《论语》

### 一、《论语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

《论语》就是孔子的论和语。论就是议论，语就是告知，使人有所觉悟。总之，它不是一般的说话，是学术理论。过去把周秦时的散文，分为记事与记言，《论语》当然是记言的了。但是其中第十篇《乡党篇》记载孔子的生活情况和言行风貌，那就是记事的了。

《论语》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作的记录，有一部分没有问，就是记下孔子的言论，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、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，还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是孔子弟子回答别人的言论，如《子张篇第十九》共二十五章就都是子张、子夏、子游、曾子、子贡的话。自来有所谓“语录体”，这便是



典型的语录体。没有许多的上下文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说完为止；而且有话也没有长篇大论，即使题目很大，也是大题短论。《论语》中最长的一章该是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章，也不到五百字。最短的只有六七个字，如“子不语：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便是七个字。所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（1713~1784年）感到孔子学说简洁可爱。孔子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、思想家、世界的文化伟人，总共也就留下了几百段语录，集中收集在《论语》里。还有一些散见在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等书中。

《论语》总共二十篇，不到五百章。因为《乡党》等篇中各个版本分章不同，稍有出入，故分为四百几十章不等。但是各章前后的顺序，大家都是一致的。至于最初编纂这本《论语》的人，他把哪一章放在哪里，有没有讲究？小的讲究有，大的讲究看不出来。例如往往有些内容相近的章，编在一起，如孔子遇见隐者的对话共有六章，编在两处，没有更分散，也没全在一起。《子张》篇都是弟子们的言论，但还有一些篇里也夹杂一些弟子的话。为什么要分二十篇，每篇为什么是那么多章，都看不出名堂。每篇的标题取各篇第一章的头两个字，也不成意义。所以，四百多段语录只是很松散地罗列着；而且，还有几章是前后重复的。两千多年来的读者和研究者，谁也没有去编一本归类而有顺序的本子。就是这样一个无体例的体例，各自可以自由地去互相联系，互相发明，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学说的整体。宋代的宰相赵普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另外那半部呢？似乎丢掉了也不要紧。不在篇章上下工夫。着重的是去实行，一个字也可以做一辈子，几百章书是“一以贯之”的，所以缺了半部也不要紧。至于《论语》的编者是谁，当然是许多弟子们去干的了。要记录几十年里在各个地方说的话，自然要由许多人来完成这项工作。大家记录以后，汇总起来，当年曾在鲁国、齐国等流传着不同的本子。这样，它的编者也就不是出于一人之手。细心的读者发现，书中对孔子的弟子都称字，如子张、子夏等，惟独对曾子，就始终不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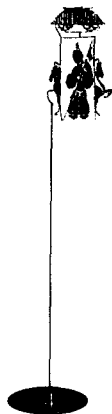


子與，十七次均称其姓，尊称为“曾子”，这就露出了马脚，曾子的学生是《论语》的编纂者或主要编纂人。还有对有若，《论语》中四次称有子，两次称有若，则称有子的地方是有子学生所记。杨伯峻先生说，《论语》中年代最晚的一章书应该是8·4章曾子临死前回答孟敬子的一段话。曾参又是孔子弟子中最年轻的，比孔子小四十六岁，曾子活到七十岁，那么记载下这段话，又编进《论语》中去，自然就是曾子的学生在孔子去世四五十年以后所干的了。

荀卿(前313~前238年)无疑是个熟读《论语》的人，他在文章中经常就孔子的观点来作发挥。他的中青年时代离曾子临死前回答孟敬子那段话的时间，大约是一百五十年，即离《论语》成书的时间不远了。我们发现《荀子》的第一篇《劝学》与《论语》的第一篇《学而》相同，都是以学习问题开卷，《荀子》的末篇《尧问》与《论语》的末篇《尧曰》相似，都是以尧的话题收卷。这不像是一个偶合，像是荀子有意安排的一个编纂意趣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感到，荀子当时读到的《论语》跟我们现在的《论语》，应该是大体差不多。

《论语》全书一万二千七百多字，过去的人是背得很熟的。由于书中句子短，语气词多，我们能感到在记言的时候，书中还保留了浓厚的口语风格，只是在后人读来，它已经成了诘屈的古汉语。《论语》的语言，以口语为基础，还需结合许多学术概念、政治用语、史籍词句，还有许多哲理性的语言、文艺性的语言。这样，它就不可能像一般的群众口语，我们也不应要求一位博学的学者只讲些群众语言。

《论语》一书的主要内容，就是仁义道德。这也就是孔子学说的核心、儒家学派的主导思想。书中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仁义道德，从个人的思想修养、为人处世到国家社会的治理。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，还有历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论。他们那时不分学科，不排课程，各人发挥自己所长，因材施教，提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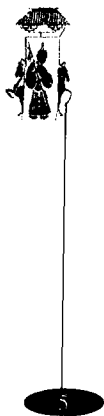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。所以《论语》一书的内容是很广泛的。

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、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(1694~1774年)读了《论语》的二十篇后说：“它们都是讨论善政、道德及美事，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，胜于希腊七圣之语。”(《中国君主专制论》第591页。转引自德国利奇温《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》第94页，1991年商务印书馆。)

《论语》担负着一个时代的使命，就是要回答如何改变春秋末年我国社会这种混乱分裂的局面(即“天下无道”)及到哪里去寻找出路的问题。这也是春秋战国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一个中心议题，大家都在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来。思想主张，在学派那里；行政大权，在诸侯手中。看谁跟谁结合起来，开创时局。

## 二、孔子学说的由来

我国自周文王、周武王大批分封诸侯，到孔子之时，经历西周而东周，如司马迁所述：“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”这五百年以后，变成了个什么样呢？一个主要的事实就是周天子大权旁落，一个显赫的统一的东方大国，变成乱糟糟一锅粥，如16·2章所说：政不再自天子出，而自诸侯出、自大夫出，甚至陪臣出。我们借用《史记》中武安侯的一句话来描述它，叫做“枝大于本，胫大于股，不折必披”。意即树枝比树干粗，小腿比大腿粗，纯属怪样，不是折断，便是裂开。时代到了那一步，主要毛病还是出于统治阶级上层，出于他们自己内部。这小腿就是春秋五大霸，还有几个小霸，他们轮流坐庄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政治上争霸权，经济上争土地，强凌弱，大兼小。小腿下面还有小腿，也在膨胀，如鲁国的季氏，齐国的陈氏，晋国的赵氏，等等。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就是荒淫无度，残暴腐朽，礼崩乐坏，道德沦丧。那还是春秋初年的事了，孔子也是知道的：鲁国的惠公看见他儿子的妻子长得好，就“自妻之”，即把儿媳妇也占为己有了，



还像个样子吗？这还是周公的后代哩！《左传》一书中，一切乱伦之事，父子兄弟无情残杀之事，无奇不有。卫国是儿子跟父亲打仗，子路还在中间起了大劲。还有春秋时代那些暴君，像晋灵公之流，残忍冷酷，以杀人为儿戏，哪儿还有一点仁爱之心？所有这一切，丑闻迭起，都被孔子一个“讳”字全部抹煞了。要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，一切腐败，一笔勾销。

孔子的思想，一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。写文章可以讳，研究问题就不能讳。根据这种情况，他认为还是要以仁义道德治天下。这是尧舜、禹汤、文武以来的良好传统。孔子以仁义道德为主旨的儒家学说，诞生在仁义道德严重败坏的时代。

德治是三代以来的传统政治，如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施实德于民。”《尚书·泰誓》：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”又如《诗经·相鼠》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”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但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里没有这种政治的理论，只有一些基本的观点，一项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建设工作，就落到孔子的肩上了。孔子出身于以周公为始祖的鲁国，那里较多地保存着周朝文化，而孔子也是以周文化的代表人自居，如7·22章所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文、武之道没有失传，还在人间，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孔子到处都可以学到文武之道。对于孔子个人来说，他生在鲁国国都曲阜，他自幼就是一个好礼的孩子。由此可见，一切条件都具备了，历史给他提供了这个良好的机遇。

孔子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理论大著，如上所述，就是语录数百条。全是口头上所说的，说多了，弟子们记不住，子路的脑子就跟不上：“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又闻。”但是这许多语录总起来看，却还是成体系的。它把仁义道德贯注到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各方面，贯注到每个君子思想修养的各方面，如人生观、伦理观、道德观、社会观、审美观，等等。诸侯、大夫都做到了，每个君子都做到了，这国和家就都不愁了。





### 三、孔子的思想

春秋战国时代,学术思想界百家争鸣。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,各自都称自己的学说是“道”。道家当然要论道,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。儒家也说他们追求道,孔子说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。法家也说“法之为道”(《韩非子·六反》)。兵家说“知道,胜”,“不知道,不胜”(《孙臬兵法·篡卒》)。那么,道又是什么呢?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道,所行道也。从辵,首声。一达谓之道。”道从首声,是声中有义的,首作动词,谓头之所向,故有引导、向导之义,正确的导向只有一个,故曰“一达谓之道”。然而百家争鸣,便不就有“一百达”的“道”了吗?既然是导向问题,那便具有前瞻性和远见性,是理想化的。当时,那么多的诸侯国,一打就是几个世纪,要打到什么地步,将打出个什么名堂来,时代的出路何在,百家争鸣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课题上展开的。

孔子活动的年代是春秋末期,七国对峙又经历二百多年,他没有见。史载有近千个诸侯国,兼并成五个,这二百多年,他见到了,最后三家分晋,变成七国。所以,孔子尽管继承了周公等的学说,他也不去怀念或拜见周天子了,他接受了这个现实,在诸侯国政治的基础上求出路,谁能“为政以德”,他便可以征服天下,而不是以武力征服。所以他说“骥不称其力,称其德也”。这是个比喻说法,很难要求它的准确性。就比喻说,千里马若是没有力,还成什么千里马呢?千里马的德就更不存在了。但是孔子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,他不可能治国而无视实力,他说要“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”(12·7)。这不是把粮食和军队放在前面吗?所以,他只是说不要去炫耀实力,而是要称赞道德。但是仅这一点,在那个漫长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,也是很不好办的。

孔子学说的重点,是在思想意识方面。《论语》中对生产和军备问题只是说要“富之”,要“足食足兵”,一带而过。比如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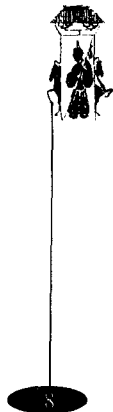


子,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就很高明,商鞅更是正面地谈论耕战,作为行政的首要问题。

孔子谈思想意识,上自国家的意识形态,下至每个君子个人的思想修养和生活作风,无不说得精细入微,既有原则,又切实可行。他要求他的学生每个人都一言一行,照此办理,而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。他招收学生号称三千人,其中贤人七十二个。他培养的君子,都要求是治理诸侯国家的人才。他不要求学生去学习种谷种菜,认为那是平民百姓、小人物的事,学生们应该去当君子,学会以仁义礼乐治好一个诸侯国家,从而赢得全天下人的归附和向往,再现一个周初文王、武王时代那样的一个礼仪大邦。

那时代国家的意识形态,主要是要忠实于这个专制帝国,君子都在为它效力。“邦有道,谷;邦无道,谷,耻也。”(14·1)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(8·13)孔子把君子的命运与邦国的命运完全挂靠在一起。义和利,要见利思义,见得思义,这是儒家的名言。不义之财,不取也,要能够甘于贫困,“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”(4·9)。道与君是一体的,孔子对待国君,总是毕恭毕敬的,“事君尽礼,人以为谄也”。他也不怕别人讥笑。但是孔子认为他是出生在一个无道的时代,“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也”(18·6)。他没有退隐,而是积极争取时机。

孔子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性,是终身不衰的。“死而后已”这句话,始见于《论语》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(8·7)这实在是一个政治家的人生观,是坚定而不平凡的。孔子是一个十分勤奋而机敏的人,他反对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”,一个人总要有有所作为,“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”(9·23),“君子病无能焉”。他经常反省自己,一是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”。二是“见贤思齐焉,见不贤而



内自省也”。他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。在言和行的问题上，他也有很精到的见解，他要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。又说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（14·27）。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南容，由孔子做主把一个侄女嫁给了他，出于两点理由：一是说他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（5·2）。二是“南容三复‘白圭’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”（11·6）。是说南容把《诗经·白圭》的两句诗念了又念，就深深地打动了孔子的心，那是两句什么诗呢？“白圭之点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点，不可为也。”是说白玉上面有了污点还可以把它磨掉，人们在言谈中有了污点，就没法办了。这样，这位南容从大处到小处都经得起孔子的推敲。看来，娶到这位侄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孔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，作了充分的估计。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吾德也。”（9·19）意思是事业的成败全在自己。为仁由己。吾欲仁，斯仁至矣。孔子的学习精神十分顽强，是一般常人所不及的。他在学与习、学与思、学与仕、温故与知新等的关系上，都有很好的见解。知识是积累而得的，“日知其所无，月无忘其所能”。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（8·17）。他感到在学习上总好像是赶不上人家，感到生活在社会中，随处都可以有学习的，大至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小至一举一动，非礼勿视。他的学习，大多是向现实学习，《论语》未见有哪个时候说孔子搬了一堆竹简、木简在看书，或者是伏案写字，师生们侍坐的时候谈古论今，或是述怀，一切都在心上或是嘴上。《论语》中也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，都是脱口而出。

孔子的学说中，充满情意。他说仁就是要爱人，又说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”（12·16）。君子都应是一个好心肠的人。要“汎爱众，而亲仁”（1·6）。那是一种胸怀广大的爱。当然他也有厌恶，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”（4·3）。他又说从政要有四恶（20·2）。这样，他的爱与恶就完全与仁、与政结合在一起了，这就超越了一般常人的好恶，而赋予了深刻的内容。



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心是沟通的,他了解和尊重他们各人的个性,然后从严要求他们。像子路这样好勇的人,对于内心的修养,沉潜涵泳,终究也不在行,但是他能终身追随、护卫着孔子,他是心悦诚服了的。

孔子对于自己的思想认识,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。“知之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(2·17)这是一句至理名言,简单而又深刻。人们的确总有一部分认识是处于半知状态,是蒙昧的、朦胧的,是属于知还是不知呢?要明智地分清这个界限。比如鬼神的事,不知就不语,或者敬而远之。又如“道听而途说,德之弃也”(17·14),你也应该心中有数,要“视思明,听思聪”(16·10),至于好胜、强辩之类,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子路就有这种缺点,孔子在子路身上总结出了这样一句名言。孔子离开现在已经有二十五个世纪,那时的科学是什么水平?虽然已经不是“鸡犬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,却也还是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”,是小农经济的发展时期,《论语》中的许多警句,至今都是富有教益的。孔子那种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,是两千多年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同程度地信守的。

孔子的心态,用他自己的话说,叫“君子坦荡荡”,他不忧不惧,因为“内省不疚”,即没有亏心事,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。若要说忧的话,那就是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”(7·3)。他感到人生是勤奋而快乐的,是乐以忘忧的,即是后来说的乐观主义。一个人生活在如此复杂的世界里,他谦虚、恭敬、诚实、礼让,以之为美德,这既是明智的,也是科学的。这不是弱者,仁者是刚毅(13·27)的,他任重而道远,不是一个刚毅而能持之以恒的人,怎么能够担当得起来?

孔子对于人民,不可能没有偏见,如说民斯为下、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“民主”一词,《尚书》中就已有了,它的含义是:民之主宰者、父母官为民作主,而不是人民作主。孔子对民有一般的泛爱,他不能失信于民,“民无信不立”,他的政治要使“近者悦,远



者来”(13·16),要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(20·2)。总之,要使民信服,国家才能协调。所以,那是阶级社会里的一种开明政治的思想。至于他的仁,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!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”(14·6)。人民只是迫切地需要仁,他们和仁义之间那道界限则是不可逾越的。不过历来人们称道他这一点,即孔子办学招生的时候,是“有教无类”的,是把教育办到民间的开始。《论语》中还说: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。”(7·7)“选举”一词,周秦时也已有了,它的含义是:上面去选贤,然后加以提拔,而不是人民投票。“舜有天下,选于众,举皋陶,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,选于众,举伊尹,不仁者远矣。”(12·22)像皋陶、伊尹这样的仁人、君子,照孔子的说法,他们在群众中也不该是小人之辈,因此他所说的小人是指耕稼的普通劳动者。他们在接受教育和社会管理上的确受到极大的限制,他们不可能有现在所说的民主和选举的权利。那还正是一个专制政治的开始和发展初期,没有忠君思想才是不可理解的。

最后还要谈谈孔子所说的天命是什么?他说他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这老天之命岂是他人间的孔子所能知道的呢?既是不知,那就不知为不知,怎么能说五十岁就知道了呢?孔子反复讲信,他绝不会骗人。他两次强调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所以我们应从整个《论语》的思想来理解。《论语》中还十次讲命运。这命或天命就成了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疑难问题。杨伯峻说:“孔子是不是宿命论者,我尚不敢论定。孔子所谓的天命究竟是什么,也很难臆测。后来的人虽然谈到很多,未必符合孔子本意。”这就提出了问题,杨先生也是取了不知为不知的态度。我们基本同意今人李泽厚在《论语今读》中的解释。李说:“我远非钟爱此书(指《论语》),但它偏偏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‘魂魄’所在。”既然不钟爱,只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它,那就会说得慎重和客观了。“最难解的是‘知天命’,似可解释到五十岁,自己对这偶然性的一生,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和认同。”(该书 52



页)他又说:“‘命’者,偶然性也,既非宿命,也非神意。即使尽力而为,也总有各种不可抗御、不可预测的偶然,人生常如此,只有深深感慨而已。”(152页)其实,岂只是偶然性,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也常常是很有限的。比如孔子对君主专制的前途有多么深刻的认识,也很难说。不过是五十年下来,对人生有了一个理解和认同罢了。《论语》的最后一章,孔子还说: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。”李泽厚说:“命也者,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。即人力所不能控制、难以预测的某种外在的力量、前景、遭遇或结果。”君子要充分估计到这一部分因素,才能任重道远而无怨无悔。《论语》中也经常说天,3·13章中说“获罪于天”,朱熹在那里注曰:“天,即理也。”至今我们还往往说天理难容,并不就是神意。总之,《论语》中确是看不到宿命和神意的影踪,我们应看清孔子思想的本来面貌。这也是孔子思想高明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我们想,问题的讨论也就至此为止了,若是再深究下去,孔子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,他只是说他“不语”鬼神,他对鬼神敬而远之,那是否还有所存在呢?整部《论语》的确是没有神意的,光这一点就足使我们珍视,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有极为良好的影响。

#### 四、孔子的成败

孔子跑了许多诸侯国家,寻求政治主张的实现。三十五岁(前517年)去了齐国,见到了齐景公。三十七岁返鲁,前后三年,没有成功。三十七岁到五十五岁(前515~前497年)一直在鲁国,季氏、阳虎那里不愿去,鲁国国君那里不能去,他没有权。但到五十一岁时,还是做了中都宰,即一个县官,第二年升为小司空,又由小司空升为大司寇,即鲁国最高法官,并代理丞相。干到五十五岁,干不下去了,是自动弃职的。由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(前497~前484年),有十四年时间,奔走于卫、宋、



陈、蔡、楚等国，也没有成功。眼看就是晚年了，就回到了鲁国，到七十三岁（前479年）去世。若是从“三十而立”算起，大约四十年，将近一半时间在外，一半时间在鲁。孔子的政治活动无疑是失败的。退而论道，致力于学术和教育工作，在思想文化上，他大获成功。他成了我国和东亚、东南亚诸国两千年来崇敬的大圣人，当今又成了联合国颁布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。不过孔子的学术工作主要不在书斋里进行，学生侍坐的时候，接待客人的时候，诸侯的朝廷上，赶路的马车上，甚至畏于匡、困于陈蔡的时候，都是他发高论的时候。

孔子的学说对不对呢？

从长远来说是对的。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主要是在儒家学说的推行下取得的，这是个基本事实。那就是在和平时期，尤其是发展时期，例如汉、唐这两个封建社会的高涨时期，汉武帝宣布“独尊儒术”，唐太宗宣称“酷爱儒学”，那也就是儒家学说的风行时期。宋代和清代，学术思想活跃，也就是儒家学说深入而有进展的时期。当然，什么时候也都会有儒学的对立面存在，只是它不成为主要的方面。

但是在孔子当时的社会，他的学说就行不通。那是一个阶级斗争持久地处于激化状态、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时代，社会各方面都处于动荡、分化的时代，谁还顾得上去讲究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道德？有几个人肯接受礼的约束？齐景公、卫灵公和楚昭王，一时都曾想试用孔子这把宝刀。但是，齐景公的耳边，晏婴一打岔，凉风一吹，就拉倒了；卫灵公郊迎孔子，几番谈话，终于话不投机，最后孔子自己走人；楚昭王更是兴师迎孔子，可是令尹（即丞相）子西一席话，主要是说孔子师生要振兴周公、召公的事业，那么楚国不过是子男五十里，能像现在这样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？所以王若用孔子，非楚之福也。昭王也就罢休了。表面上看似似乎都是三位诸侯一念之差，实质上是不能接受孔子的主张，即使接受了，也早晚是弄不成。只是在鲁国，已经当了



代理丞相，可以一展身手了，何必因为齐国送来一个八十人的女乐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歌舞团，孔子就自动离任呢？我们原以为孔子未免太脆弱了。你是代理丞相，你可以想办法绕几个弯，软硬兼施，把那个歌舞团送回齐国，或解散了事。你孔子应该珍惜这个时机啊，你一生追求的不就是这种时机吗！可是再想一想，还是孔子的学说与季氏、鲁定公的思想和政治背道而驰。孔子看不惯他们，他们也听不进孔子的，迟早是各走各的路。及早一走了事，倒也干脆。而且，人家孔子总是走一步，估计到下一步，留有余地，等到双方翻了脸，甚至动了拳脚，动了干戈，就不好办了。君子是动口不动手的，那不就只有挨打了吗？总之，在周代分封制一败涂地的情况下，孔子的学说在政坛上没人要听。想听的人就是那些已经沦为平民的贵族，他们已经丧失了土地和民众，无法挽回，没有发言权了。

从以上长远和当时两方面来看，孔子的仁义道德，看是对何时、何地、何人、何事来说。其实，它本是周公手中的治国大纲，曾经是开创了一个大时代的，怎么会从根本上就错了呢？例如《论语》里说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（1·2）在宗法社会里，国君对他的儿子来说，既是君臣，也是父子，忠、孝、仁、爱就是一个东西，孔子这句话就一点不错。但是超出这个范围，这章书就有问题了。比如韩非子举了这样的例子：“鲁人从君战，三战三北（北，即“背”，败退）。仲尼问其故，对曰：‘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养也。’仲尼以为孝，举而上之。以是观之，夫父之孝子，君之背臣也。”（《五蠹篇》）这里，忠和孝是两个东西，而且抵触起来了。但是还没有犯上，不过是当个逃兵，若是我们看看历来犯上作乱的，孝子也大有人在。例如梁山好汉李逵的孝心就非常可爱，《李逵探母》的戏不是很好看吗？但是他照样要犯上作乱，而且很坚定，人们都喜欢他。

这样说来，《论语》这本书，首先要给国君和他们的继承人





看,他们如能接受孔子的教导,邦国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其次叫大臣们看,叫大夫、士们看,让他们不要膨胀。孔子并没有叫小人也去读《论语》,用不着跟小人去费这许多心力,社会问题主要在上层。然而就在所谓的小人中间,孔子的仁义道德却大大地传播开了,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民间的习俗、民族的传统,远远超出孔子的意料。

从孔子方面来看,从当时人们对孔子的批评意见来看,孔子对仁义礼乐这一套东西的分析与批判继承的工夫,是欠缺的。所谓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,是全盘接受的态度。我们很重视齐国贤相晏婴对孔子的批评,说孔子的礼与学,“累世不能殫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”,即是学不完、讲不清,君臣之礼、丧葬之礼,都是如此。表现在《论语》中,如9·3章,大家把礼节简化了,他不能简,“虽违众”,他也要坚持。他自己也说“事君尽礼,人以为谄也”。从孔子又过了五百年,到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评到众家要旨时,太史公也是用晏婴的话批评儒家,说是“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,故曰‘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’”。我们讲究礼节,是最需要适可而止的,看情况随时掌握,轻了重了都不合适。孔子是过多地拘于礼了。又如在对待武力的问题上,他也缺乏分析灵活的态度,在那个强权政治的时代,一概不谈力,就很不好办。连文王、武王的暴力也在“不语”之列,对待暴君也不主张起来叛变和杀戮。卫灵公问军旅之事,他就回答俎豆之事,所以就谈不到一起了。比如谈谈仁义之师,诸侯们不是很感兴趣的吗!所以,“子不语:怪、力、乱、神”,这句话很精辟,但是中间力、乱二字要具体分析,只有部分的正确性,不能一概不谈,是时代的潮流呀!

综上所述,可知《论语》一书的又一特点,便是精华与糟粕杂陈,里面有十分精彩的东西,也有很糟糕的东西。主要的,无疑还是前者。